

熊映梧著

为新时代的 经济学 催生

1978-1998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龙江学人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为新时代的 经济学催生

熊映梧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曙光 吕观仁 李文方

封面设计:陶雪华

1978—1998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龙江学人卷

刘敏中 主编

为新时代的经济学催生

Wei Xinshidai De Jingjixue Cuisheng

熊映梧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哈尔滨印刷六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20 8/16·插页 5

字数:500 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 001—3 000

ISBN 7-207-04267-1/F·817 定价:32.00 元

1978—1998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
题文存·龙江学人卷编辑出版
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任:冯东海

委员:张绍勤 李曙光 韩继海
衣俊卿 梁凤鸣 刘敏中
李文方 姜 影 吕观仁

总 序

从经济乃至物质的角度来评价历史,自然会得到较多的赞同;而且,经济的物质的发展水平,果然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判断人类文明水平的尺度。这一点,我们翻开任何一部历史书都可以得到印证。但是,到了以 1978 年为起始的 20 年后的今天的中国,我却宁愿以另外一种角度来评价历史,这个角度就是:人的思想与境界。

当然,一般说来“思想境界”一语似乎有些虚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目光集注于人类发展的某块解剖学意义的切片上,

而是站在黑格尔老人的历史感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立场上；或者，站在爱因斯坦的进化观的立场上，则易于理解这一问题。

宏大而漫长的物质史、自然史及至人类史，就是在统一地表征着这样的真谛：生命现象是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精神现象是生命现象发展的高级阶段，精神现象水平高下的标志，就是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下。它们确乎构成一个自低到高的、级次性的发展系列。

所以，我心悦诚服地赞同爱因斯坦如下言论：

我绝对深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这事业最热诚的人的手里也是如此。^①

一个人为人民最好的服务，是让它们去做某种提高思想境界的工作，并且由此间接地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②

那么，这里的思想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内涵应有如下诸点：

智力、情感的健康发展；

人格意识；

对知识的追求；

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热情；

信念的执着；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37页、第36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37页、第36页。

对意志独立、精神解放的渴望；

对世事、人生发展的美好憧憬与从容应对，以致内心澄明；

对自然的存在、秩序、奥秘的欣喜与挚爱，以致气象恢宏；

如此等等。

这些看似虚空的东西，当进入历史的时候，样样都是具体而真实的。

这并不是书生的虚言。

我钟情于“思想”，因为，所谓“灵魂”，就是它。

我赞赏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而不管哲学家们怎么说。它蕴涵着一个极其明白而又极其深刻的道理：我“是”我的明证，就在于我思；而我吃着，无论吃什么，都不是对我的确证。

我惟有被确证，我才会“有”水平和境界，我才有意义。

人的进步，就是思而有所悟；人的进化，就是对思之思，以致思思不已。

所以，思的水平就是人所达成之境界。

所以，国民思之水平，就是民族、国家所达成之境界。

所以，思的境界的提高，就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才是最终的解放。

所以，一切教给人之思的，激励人之思的，解放人之思的，都是至美、至善的。

我就是以这样的，或可能被讥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为主要依据，来评价 1978—1998 中国的 20 年间的历史的。

难道当我们以这种观点来审视中国过去 20 年的历史的时候，反思 20 年来我们自身的时候，不觉得那些仿佛虚空的东西都一桩桩地化为具体而真实了吗？

我认为,1978—1998,20年间,中国历史的最难得的、超乎人想象的变化,就是她让她的人民思了,激励她的人民思了;她的人民会思了,她的人民思出境界来了。

如果你并未囿于思的任何单一方面或纯个体之思的褊狭之见的话,你肯定也看到了1978年后的中华民族的境界的提高。

我们应为此而欢欣。

学人思着,亦复思别人之思、思民族之思、思国家之思。

学人以其独特而庄严的方式表达着其所思之种种,故谓思想家。

中国当代的学人以思想家之姿,“制造”着关于1978及其后的20年来的中国的思,于是,他们有了著作。

那著作里涌动着20年来中国人的思之潮,——它的契机、发端、过程和所达成的成果、境界。

鉴此,于1997年秋,我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建议编辑一套“1978—1998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丛书。我以为,这可能成为中国这20年的一种民族进步史、社会文明史。

这一建议得到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出版局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慨然且欣然的支持——政府拨款、定为“部长工程”,等等。

“丛书”定名为《1978—1998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1978—1998,——指明思之时限;

中国,——指明思之空限;

学术,——表征着学人之思的方式、形态;

前沿性,——表征着学人之思的时代性、尖端性;

论题,——表征着学人之思的对象、问题。

但是,可惜,作为思在黑龙江这块土地上的我,学养瘠薄,视

总 序

野狭小，勉强敢于对黑龙江学人的一小部分著作进行学术编辑，而将“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的其它著作，暂付阙如，留待堪其任者。以故，“文存”的第一批称为“龙江学人卷”。

事实上，即便仅就龙江学人 20 年间的学术著作而言，所该选择的也不应仅如所呈现给读者的 10 部。此项工作的诸般不妥，自是分明；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以此 10 部为先头而已。

但愿后续可期。

刘 敏 中

1999 年 3 月 19 日于黑龙江大学

序：拼将余生著新说

王恺 张艺

记熊映梧教授不平凡的学 术生涯和学术观点

一、追求，不断地追求

经济学家熊映梧近 20 年来引起国内外的注目，有位老经济

学家称赞他是“改革时代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他是怎样成为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呢？他自己回答说是：时代的造就，个人的不断追求。的确，追求，不断地追求，是熊映梧学术生命的主旋律。我们将沿着这一线索去揭开他治学的秘史。

1929年10月3日，熊映梧出生在鄂西松滋县城小镇，在那里上过私塾和洋学堂。念初中的时候，日寇侵犯鄂西一带，熊映梧于1943年流亡重庆，后入国立第二中学读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好友结伴北入天津市立二中学，开始了高中学业。在那里，受到民主学生运动的熏陶，认识到不推翻“三座大山”，“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是无法实现的。1948年夏高中毕业后，他像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背叛剥削家庭，投奔解放区”。几经周折，在1949年3月入华北大学，经过短期学习，于1949年10月分配到哈尔滨外语学院工作。做了4年行政工作后，眼看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他又异想天开要当经济学家（在50年代初，是鼓励青年人当红色专家的）。在那百业待兴、人才奇缺的年代，边干边学是常规。熊映梧也是先教书，后学习。他在教了3年政治经济学之后，于1956年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班学习（获本科毕业证书），1962年又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班进修一年。从学历上看，熊映梧没有按部就班念大学，也未留洋，更不在名牌大学执教，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学历。但是，他却有一股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在做学问上总爱“打破砂锅纹（问）到底”。有人好心劝告熊映梧：“你出身不好，教政治课是个危险的职业，要小心谨慎。”他却一笑置之。60年代初，他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官方结论，招来一次历时半年多的“省级批判”。文革中，他还未摘掉“反毛泽东思想”帽子的时候，竟敢同姚文元唱对台

戏，著文宣称“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批林批孔高潮时，他写了一首讽刺诗：

“颠倒历史更颠倒，儒法两家扮主角。
出将入相今胜昔，群氓依旧跑龙套。”

80年代初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资本论》也有“历史局限性。”按常理，像他这样一个35岁就荣获“反动学术权威”头衔，文革中受尽屈辱的人，应当是只“惊弓之鸟”。可是，面对不断升级的批判，熊映梧却对之以“曾经沧海不怕水”。人们问他，为什么如此大胆，屡屡标新立异？他回答说：“追求真理的强烈欲望，压过了恐惧心理。”

二、模仿——彷徨——彻悟——创新

熊映梧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坦白地讲述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走过的弯路，希望他们引以为戒。

在1953年开始教政治经济学的时候，熊映梧也照抄照搬苏联教科书；大跃进年代，他曾为“共产风”所激动，发表过不少鼓吹“三面红旗”的文章。他积极组织编写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嫌社会主义不够味，取名《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接踵而至的饥荒年代，使熊映梧从幻想回到现实。“肚皮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这句幽默的话包含着沉痛的反思。在熊映梧刚刚迈开独立思考步子的时候，遭到迎头一记大棒。这就是1964年在黑龙江省对熊映梧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大批判。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熊映梧自然是“在劫难逃”。那时，每晚从

劳改队回家的途中，他总要偷偷在小酒馆里喝几两，麻木神经，苦撑度日。但有一条：他从未想到自杀。因为，他执著地要看看这场闹剧怎么收场。他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

“9·13事件”使熊映梧开始彻悟，他利用文革后期的自由时间，读了很多书，写了大量的笔记。这是80年代他高产的秘密所在。可以说，熊映梧的学术生命从1978年才开始。他花了30年的宝贵时光，走过了从模仿到彷徨，再到彻悟的漫长道路。在50岁那年，他感慨地写道：

“坎坷半世心力衰，腰弯骨损志难改。
拼将余生著新说，毁誉存亡置度外。”

他正是用这种“拼将余生著新说”的精神，冲向沉默多年的中国经济学界。在短短的10多年里，熊映梧发表了8部专著、上百篇论文。作品数量之多，观点之新颖，文笔之锋利，气势之磅礴，很快赢得了经济学界的注目。

熊映梧多次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受到青年学生和教师的欢迎。在为北大经济系研究生作的学术讲演中，他说：“神学是一代不如一代，科学总是后人超过前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后人为什么不能超过马克思、列宁呢？”这一番言论，在青年经济学者中广为流传。正是这种反对神学、提倡科学的精神，使熊映梧不畏权势，不怕围攻，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人们大唱赞歌的时候，发表了《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这篇爆炸性的论文。今天回顾此文引起的风波时，熊映梧坦然地说：如果中国学术界因为马寅初、李平心、孙冶方、“三家村”受到批判而觉醒的话，个人受点委屈，那是不足挂

齿的。

模仿——彷徨——彻悟——创新，熊映梧走过的这条曲折的治学道路太漫长了。他的学术最佳期早在批判中消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曾发誓说：“天公假我以时日，呕心沥血偿书债。”熊映梧的雄心未减，还打算为自己的“生产力学派”创造更多的佳作。

三、三次“标新立异”

有人批评熊映梧“爱标新立异”，他引以为荣。他认为，科学就是靠不断地标新立异而向前发展的。如果几千年念一本经，那还有什么科学？熊映梧对研究生讲：学问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知识，即前人对文化宝库的贡献；一是见解，即当代人对文化新增加的东西。光有存量，人类文化就太贫乏了。所以，做学问固然要有知识，充分吸取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要有新见解，为人类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生产力首位论”——是熊映梧的第一次标新立异。在陈岱孙老先生的帮助下，他的论文《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主办的《经济科学》1980年第2期发表。文章尖锐地指出：“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这些年来，极左思潮在我国泛滥成灾，其理论上的根源就是要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搞‘穷过渡’。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摆脱困境，求得繁荣和发展，就必须跳出自己画的‘地牢’——只研究生产关系，到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广阔天地去。”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不

乏其人,赞同者也大有人在。熊映梧不喜欢打笔墨官司,他在一声叫嚷声中,退回书房,潜心研究生产力理论,在光远先生的指导下,开创了一门“生产力经济学”。老天不负有心人,他主编的专著《生产力经济学原理》获得了1988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生产力三部曲”(《生产力经济学原理》、《当代中国生产力考察》及《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三部专著的总称)获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等奖,他被选为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如今,最高决策机构确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谁也不再怀疑生产力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奇怪的是,管学位的部门至今仍然不承认生产力经济学是二级学科,不让熊映梧这位饮誉中外的著名生产力经济学家担任博士生导师。对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很多青年学子愤愤不平,而熊映梧却淡漠得很。他说:历史上有几个大学问家为当代人所承认?

“《资本论》也有历史局限性”——是熊映梧的第二次标新立异。

1983年熊映梧在上海《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了《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其轰动效应大大超过“生产力首位论”。未曾预料到,一篇学术论文,竟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政治风波。一阵子,熊映梧这篇论文成了众矢之的,辱骂者有之,恐吓者有之;或无中生有,或歪曲上纲,或赤膊上阵,或含沙射影。对一场文革式大批判,熊映梧这个“老运动员”泰然处之。他经过两年冷静思考之后,于1985年发表答辩文章《再谈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有理有据地回答了批评者的责难。

给熊映梧扣上的一顶可怕的“帽子”是“批判”《资本论》,这是不实之词。熊映梧盛赞《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科学著作,同时,也指出,《资本论》也如同一切科学著作一样,不可避免

地有历史局限性，并列举其四种表现：

(1)《资本论》的某些原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实际情况概括出来的，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阶段。如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

(2)《资本论》中的某些原理，论据不足，难以成立。如生产价格的构成，为什么缺少地租？

(3)《资本论》对未来的某些预测，尚属于未来学的范畴，有待于今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期估计过早，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经济，也不符合实际；

(4)《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静态分析，缺少动态分析。

在《再谈》中，熊映梧回答说：如果《资本论》没有历史局限性，一部《资本论》治天下（不知是否包括“外星人”社会），马克思主义岂不蜕变成神学了吗？他理直气壮地写道：《资本论》的原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都要发展。发展意味着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修正、完善已有结论，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断创立新的学科、新的学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将产生众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工人阶级的理论体系不是趋于僵化、贫困化，而是日益丰富化，多样化。

第三次创新：创作《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中华民富论》是作者半个世纪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该书是作者“半个世纪的观察与思考”。该书序言写道：“作者有幸参加了新中国半个世纪社会主义试验的全过程，饱尝了几十年的酸甜苦辣，目睹了大成功与大失败，积累了洋人及青年人不可能有的亲身感受，因而萌生了创作《中华民富论》的强烈愿望。”的确，

该书不是即兴之作,更不是应景文章,而是作者出于一种时代责任感,对于他曾参与的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给后人一个客观真实的交代,为下一个世纪中国一二十亿人民的共同富裕出谋划策。像他自己讲的是“手无寸权,心忧天下。”其用心可谓良苦也。

《中华民富论》包括《历史经验篇》、《改革篇》、《发展篇》及《反思篇》共十二个专题,每个问题的论述都有新意。

——“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和社会制度的可选择性”,是作者分析国情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新中国 50 年的历史教训表明,对国情的判断有 6 个不同的结论,在制度选择上也可以以领袖的意愿而定,但是社会发展阶段却是不可逾越的,至今我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的阶段,还要补工业化的课。

——“富民的纲领是消灭私有制,还是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作者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试验的历史教训,指出: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十五大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不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化吗?

——“公民产权本位论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是作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以及市场社会主义试验的理论概括;与此相关,作者认为国企改革实质是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即从以国有经济为基础、以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向以公民产权和民营经济为基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新社会主义。

——“21 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作者在《中华